

哲学解释学和“六经注我”

夏 镇 平

近年来崛起的哲学解释学具有融会各派哲学之长，自成一言之趋势。本文试图运用解释学的方法分析中国哲学史上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朱熹的《太极图说解》的差异及其原因，以作为学习西方哲学，“洋为中用”的一个实例。

同属于宋明理学的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与朱熹的《太极图说解》之间的差异以及由之而起的争论具有很独特的意义。首先，各代学者考证的史料可以证明，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所写的《太极图说解》是不符合原意的，尤其是朱熹把《太极图说》首句“自无极而生太极”修改为“无极而太极”，更是没有根据的。（见《宋明理学史》、《论宋明理学》）不仅如此，朱熹在《太极图说解》中还处处用意，句句着墨，意在消解掉原作中所含明显的道家因素，从而使《太极图》与《太极图说》成为纯粹的儒家著作，并以此把周敦颐尊奉为宋明理学的开山祖师。然而，尽管史实是如此确凿，朱熹的《太极图说解》仍然在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尊为《太极图说》的正解，他所修改的《太极图说》首句甚而代替原作而成为通行的版本。一方面是由充分的史实证明为歪曲的结论，另一方面则这种歪曲的理论却构成宋明理学的主流，并一直受到后世的承认。这是一种多么矛盾、何等奇特的现象。

对此似乎只能有两种解释：或者断言

朱熹的注解歪曲了周敦颐的原意，这样能同史料相吻合，然而却必须说明为何这种歪曲却在一千多年来一直被人接受，奉为正宗；或者可以宣称朱熹的注解完全符合周敦颐的原意，但这就与史料考证相违背。两种解释，彼此相悖，而且每一种解释都包含着难以解决的内部矛盾。出路究竟何在呢？

如果我们引进解释学的观点，对上述悖论细加推究，就不难发现，上述两条结论无例外地都隐含有一个逻辑前提，即把作为哲学史研究对象的史料看作一种自我封闭的体系。这种史料所包含的信息量是个定数，而且不可变动。按照这样的逻辑前提，自然，我们这些研究这种史料的后人所应做的最重要的事，就应该是努力克服自己的偏见，穿越岁月造成的种种屏障，最终使自己置身于这种史料的本真意义之中，从而客观地破译史料所含的意义，犹如破译一份用密码拍发的电文。这种观点貌似客观、科学，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

首先，作为哲学史研究对象的史料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对象，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的含义决不是一经破译就使人一览无遗的电文，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生成、变化、扩展的过程，这种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如果把史料认作自我封闭的体系，它所含的信息量是个定数而且不变，那末，随着人类研究的深入，就会发

现可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少，并将最终有一天，人们除了对于一种已经穷尽了一切真理的绝对体系惊愕地呆视之外，就无事可干了。这种观点的荒唐早经马、恩作过辛辣的讽刺，而且实证的、经验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种观点的错误。

其次，史料之所以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由于史料总是由人创造又由人研究的，而任何人都只能是生活于一定社会之中的人。社会是一个变数，那末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摆脱自己社会性的人就不能不是变化着、生成着的人。由这样的人创作的史料又由这样的人进行研究，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视野，人也不可能摆脱历史的视野。因此，一定时代的史料在不同时代的研究者眼里就会生成不同的意义，从而使史料具有开放性。实际上，哲学史这门学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一点的证明。例如，尽管历史上研究四书五经的文章早已汗牛充栋，谁能宣布四书五经的含义已经破译完毕了呢？随着时代的进展，人们必然会从新的角度看待这些古代文籍。试想，把时间倒转50年或100年，谁可能去研究朱熹或周敦颐思想中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因素呢？反过来，谁又会斥责今天中国的哲学工作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哲学史是曲解古人原意，从而要求我们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而改以当时的儒家、道家或佛家人物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研究呢？

因此，哲学史从而也包括一切历史研究的实质就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之间的对话，并最终在对话过程中达到一种视野的融合。既然认识中的先验之“我”是无法消解的，那就干脆不要妄费心机进行消解而可以反过来，促使自己去积极地获得视野，并主动地进行视野的融合，这样就会

不断地生出新的意义，这种新的意义就会积淀成传统，成为文化，成为时代精神，而整个人类生活的实质就不外是这种传统的生成、融合、扩展。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主动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就主动地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那么什么是评判一种解释真伪的标准。既然作为研究对象的史料是开放的变数，既然解释的本质在于不同视野的融合，那末，评判一种解释是否正确的标准，只能是一种生成的标准，只能看这种理解是否符合时代精神的发展，就看一个理解者是否把握了古代文籍所处时代的精神并把这种精神纳入理解者自身所处的时代精神之中。

确立了以上原则，并以此衡量朱熹和周敦颐的差异，我们会获得一种新的看法。

一、周敦颐所生活的北宋初年，中国在政治和文化生活上各经历了一次大动乱。政治上的动乱是五代十国，文化上的动乱是儒家自西汉被定为中国百家之尊后曾连续受到魏晋玄学尊道和佛唐崇佛的冲击。宋王朝需要政治上的安定以及思想文化上的天下一统。这一点为儒家思想的复兴打下了基础。（《论宋明理学》第1—13页）

二、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的冲击，暴露了儒家思想固有的弱点。在新形势下复兴儒学就决不可能只是简单的回复，而应是进入高一阶段的扬弃。因此，援道、佛入儒，实行三教合一、儒学为宗是当时的必然趋势。周敦颐正是这一思潮的第一位先驱。尽管他的思想中杂有相当多的道家因素，但他的《太极图》和《太极图说》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建立了以宇宙论为基础，以人性论为中心的哲学体系的雏形。尽管在《太极图说》中还可看出机械拼凑的明显痕迹，但他在客观上，为引道

入儒、以儒解道，并以此构筑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的做法开了先河。

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作为当时代的学者，朱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时代使命，并且敏锐地认识到周敦颐思想中引道入儒以达儒道合流的思想脉络，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正是基于这个前提，朱熹对周敦颐的著作作了符合时代精神的重新解释，并且消除了周敦颐思想中的矛盾。这在《太极图说》首句的修改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周敦颐是第一个建立起宇宙论、人生论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在他之前，儒家着重谈政治、人伦而弱于谈世界本体，就使人性论失去了“根”。周敦颐为儒家思想找根，现成的材料就是道家。何况，要谈万物的本源，如果以“有”作根似乎是很困难的。因为，既然是“有生有”，那末人们必然会问，这个“有”本身是何处来的。若仍说“有”，则原因与结果同，等于没有回答。因此，追寻万物本源，从“有”推到“无”，得出“无”中生“有”的结论应该是合乎逻辑的。但这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无”和“有”是异质的东西，何以相生？从“有”出发向前无限追溯，始终只

能得到“有”，从“无”出发，向反方向无限追溯，也只能得出“无”。这个矛盾不但是周敦颐的矛盾，也是主张“有生于无”的道家无法解决的矛盾。朱熹用一物而两解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显得十分高明。既然是“无极而太极”，那末，一方面，作为万物本源讲是无载无臭的“无极”，避免了“有有相生”无限循环的推论；另一方面，则又是“太极”，故可化生万物，避免了“无中生有、异质相生”的跳跃。由此，道家因素完全被儒家思想消化，既符合时代精神的需要，又体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

如果说本文的分析所依据的基本是哲学解释学的方法，那末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早就存在与此相应的传统，它被形象地概括为“六经注我”。如果说在中国哲学中“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这两种对立传统的斗争中，“六经注我”以它的灵活性和富有创造性而得到更多的哲学家的首肯，那末它也同样暴露出一定程度的相对主义，这也是哲学解释学难以解决的难题，这个难题有待解决。

（本文作者系中央党校哲学
专业研究生）

（上接第26页）

其次是财政政策。为引导和促进某些特定行业（如新兴工业）与特定产品（社会效益、宏观效益特别好而微观效益较差的产品、市场急需的短线产品）的积极发展，各级财政有必要建立较大数量的财政周转金和投资项目利息补贴基金，以有计划地促进这些特定行业、产品的健康发展。

然而，即使以上政策都能兑现的话，企业合理投资的内在动力问题尚不能说能完全得到解决，还务必在如何改善企业行为和规范化地增强企业合理投资的内在动力上深入探索，以提出适宜的对策。